

日治時期的產業政策對南投陶的影響

●黃培蓉●

摘要

日治時期在殖產興業政策下促成了台灣民間陶瓷業技術能力、市場需求、風格樣貌等諸多方面的轉變。因此台灣陶業的發展脈絡和國家政策的轉變有著顯著而交互影響的關係。

本篇文章主要是透過既有文獻研究與筆者在當地的訪談結果，歸納出以下五階段影響南投陶產業發展政策的演變：

1. 殖產興業—產業革命的啓動：殖產興業政策的提出促成近代日本產業革命的發展，也直接影響了南投陶進入產業工業量產化的階段。
2. 在職教育——引出創作的潛力：技術養成培養了陶藝師傅製陶技術的功夫，也啓發了陶藝師傅樸實的造物心念和創造能力。
3. 量產技術——經濟利益的提升：透過工業開發的經濟型態，南投陶在此階段以『量產』技術提升了更多的經濟性利益並進入了產業化的經營型態。
4. 象徵符號——殖民成果的紀錄：這時南投陶被彰顯的意義乃在於經營殖民地的成果紀錄。
5. 國家目標——軍事需求的用途：在動員體制下的南投陶產業，被賦予了軍事工業的階段性任務，『防空缸』成為此時期的特殊產物。

日治時代代表『南投陶』的陶器是肩負任務的，這種任務是一種國家記號所賦予的改變，並隨著國家所給與的技術知識展現出一套特定的美學標準與功能形式。

關鍵字：殖產興業、南投陶產業、防空缸

壹 殖產興業政策下的南投陶

一、殖產興業的資本主義化現象

殖產興業為一項政策，是明治政府於1870年，設置『工部省（工業部）』之後開始推展的方向，共執行了十五年的時間，主要內容是以『富國強兵』為目標而施行的一種經濟政策。在此目標的前提下明治政府從國外引進諸多的機械設備與技術，繁殖物產，提高生產量，成為以國家為主導產業革命，成為累積『富國強兵』下最重要的經濟資本。也就是說，工業化的推行啟動了日本的資本主義化現象¹。

19世紀末，全球資本主義已發展到一種產業資本的階段，故而能夠『輸出剩餘資本』的場所，成為列強各國在分割殖民地的一項重要目的，也就是一種銷售市場的取得所因應而起的殖民風潮。在此社會環境下，1885年福澤諭吉提出“脫亞入歐”²論，逐漸受到日本國民的重視，從而產生了入日本侵略中國及其他亞洲國家的正當性思想。在此時代背景下，日本為了積極擺脫『二流國』成為『一流大國』的目標，遂而採用武力擴張的方式來掠奪殖民地，以獲得海外資源和市場的需求（潘志奇，1957：7）。當時的日本是以軍事的手段作為資本的擴大方式，首當其衝的便是鄰近的中國。1895年，中日戰爭的結果，台灣割讓於日本，台灣成為日本執行殖民政策下，具體實踐的場域。

二、南投陶產業化的經營

1895年日本政府為了順利統治台灣，以施行『軍政統治』的方式，用武力收服台灣的反對勢力，其後在1896年廢除『軍政統治』。1898年南投辦物署長矢野武平氏為了開發產業，乃計畫改良固有的南投陶技術，也代表了致力於本地經濟開發的開始，此期的南投陶產業在矢野武平式的規劃下，被納入推動地方經濟發展的任務，為整個南投陶產業的發展方向預留下一個伏筆。

在隔了五年後，1901由南投廳長小柳重道氏繼續推廣矢野武平氏的陶業計畫，而在此同時台灣總督府成立了立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並發佈『台灣舊慣調查會規則』，其內容主要是著手進行台灣的法治調查及經濟調查，而調查台灣資源是日本政府為了瞭解此地資源、方便統治的一慣手法。1905年『調查經濟資料報告』出版，報告內容反映出20世紀初台灣社會經濟情況，對總督府產業政策的決定有重大的參考價值。其

1 『明治政府的殖產興業政策，其目的在於引進機械式的大型工業，以促進日本的資本主義化。也就是推展鐵道、電信、等交通通信機關的整備，製絲、紡績等衣料工業的引進，軍事工業的育成。』田村貞雄著，葛東榮譯，1992，《殖產興業》，台北：方智出版社，頁265。

2 1885年3月16日，福澤諭吉在《時事新報》發表了著名的脫亞論，在他的觀點裡認為『日本人應該不要再眷顧落後的中國與朝鮮，要快速加入歐美先進的行列，才能成為世界的一流大國。』1885年福澤諭吉提出的此觀點，影響了整個日本近代化的思潮甚巨。

中有關陶瓷產業記載著以下內容：『台灣的窯業極其幼稚，細工捏製陶器極少，…大多都是些粗雜土鍋、土瓶、水甕等種類素燒等土器，…施予丹釉再入窯燒製的陶瓷製品，為數相當的少。一般日用陶瓷及精緻性裝飾陶瓷，大都從中國大陸輸入。…年輸入金額至少在十萬圓以上。』，從以上敘述中可得知至少在1905年之前台灣的陶瓷還是多仰賴大陸輸入，這對於當時日本以台灣為銷售市場的期待不同，知道本島有多少可用的資源、有多少可以發展的空間，是日本不斷透過調查在做的符合母國利益的前置作業。1921年連橫在《台灣通史》中所記載的製陶業和舊慣調查會所呈現的內容大致相同，都是在描述台灣當時窯業技術尚未大興的現況。

在1914～1918期間，日本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歐美至遠東市場撤退的影響，遂得以獨佔的地位進行貿易，這就是日本資本主義所謂的『黃金時代』，在此時期台灣許多新興的工業發展至為迅速，內容包括金屬品、紡織、化學製品、窯業等，其中價額增加率方面窯業約成長了六倍（潘志奇，1947），這代表了台灣在此時窯業被納入工業用品的類別中而有大量生產的趨向。但是窯業詳細的內容項目為何研究者尚未找到更確定的資料，僅就根據網珊『台灣工業之特徵』一文中，所整理的表格發現當時的窯業是將『陶瓷器與釉彩業的製造』和『其他窯業』分開統計，也就是說陶瓷器可理解為『民生用陶』之功能，除去民生而有專門用途的，研究者暫歸類為『工業用陶』，本文要探討的南投陶即屬於前者，產品內容有家具、食器、便器、水壺、水甕等。整體而言，在本島窯業工業化的推動下，製作民生用陶的工廠比例，遠遠低於製作工業用陶的數量³，但是這個現象在牛運堀地區卻正好相反，牛運堀的六家窯場幾乎是以民生用品為主，工業化的現象被貢獻在機械化的技術方面，例如電動轆轤、動力練土機、動力擠泥機的引進等，藉由這些動力設備的改良上使南投陶得以創作出豐富的題材形式，增加了產品情藝層面的價值。

3 根據網珊的統計資料，1941年末，『窯業及土石工業』使用動力工廠以及平時用五名以上的職工或有同等設施的工廠共計733家，大台中州占136家，工廠數量排全國第三。在陶瓷器及釉彩業方面，僅次於大台北州一家，形成北中陶瓷產業的集散區。參閱網珊：〈台灣工業之特徵〉，《日據時代台灣經濟之特徵》，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頁84。

項 目	台 北	新 竹	台 中	台 南	高 雄	台 東	花蓮港	澎 湖	合 計
窯業及土石工業	146	64	136	233	106	2	10	36	733
陶瓷器製造及釉彩業	20	9	19	3	2	—	—	—	53
玻璃及玻璃瓶製造業	7	2	1	2	—	—	—	—	12
水泥製造業	1	—	—	—	1	—	—	—	2
其他窯業	112	51	108	220	96	2	6	36	631
水泥及石綿品製造業	6	2	8	8	7	—	4	—	35

三、掌握窯業資源的民間團體—南投陶業同業組合會

『組合經濟』的概念，是法西斯主義⁴有關經濟體制中一項重要的基礎。他重要的理念是從維持企業家活動的同時，由國家機關對私人活動進行統治，以實現所謂的『國家目標』（林繼文，1996：3）。因此類似這些組合組織，形式上雖然是私人自治團體的性質，但事實上則是國家透過產業中的單一化規定來達到符合『實現國家目標』的監控管理。

日本的統治經濟相較於歐洲國家更具有國家控制的色彩，這是因為在發展的過程中，德、義乃是從市民運動的方式透過選舉取得國家政權，才完成國家的法西斯化，但日本的法西斯化則是經由既有的國家機關，由上而下運用的市民社會中的右翼運動來達到整體改造的目的，在此體制下『組合』的民間性質型態因此更低（林繼文，1996）。1931年日本發佈的『重要產業統治法』，即逐漸走向統治經濟的階段。這項政策比1927年成立的『南投陶業同業組合會』晚了四年，這代表了在頒佈法令之前，南投組合會已經在做『控管』這個工作性質相關的事務了。

在當時成立組合會的目的文獻記載是為了統一產品價格，穩定市場之用。但根據當地耆老劉案章先生說『當時只有組合會才有機會申請補助款，那時要要求大家價格統一是有點困難』的講法⁵及同年南投陶又開始獲得州、街政府大力補助的跡象看來，業者對於此一合作社的成立所認為的意義似乎與總督府的認定不同。回歸到『國家目標』的立場來看待此一矛盾點，就很清楚的顯現出『組合會』在此時期對國家的意義所在，透過民間單位進行經濟活動的掌控以達到國家所需要的目的，存乎著一種代理機關的意涵。

在此條件下，地方產業組合是由總督府直接任免各組合之組合長且在直接接受官廳的監督情況下，產業組合不但成為行政機關的附庸，更成為殖民地政權籠絡地方勢力的重要機關（林繼文，1996：3）。因此對於劉樹枝在當時被南投郡守田村三郎指名為『南投陶業同業組合會』的組合長事件而言，就存在了一層更深的含意，也就是『國家目標』的實現。中日戰爭後1938年4月所訂定的『國家總動員法』則更加凸顯出國家對成立組合會的實質目的。

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日本政府開始對台實施工業化、皇民化的策略，工業化政策在此背景之下成為應付戰爭需求的技術發展，以加強台灣物資的動員能力。皇民化運動，則是企圖用一種文化統治的力量方式來消除台灣人民的反動意識，並從這過程中轉換成能被日本政府所信賴的人力資源，也就是說工業化帶動了物力動員的部分，而皇民化則意含了人力動員的能量，這二者之間都是為了此期的軍事需求為前提的現階段任務。

4 法西斯主義在歐洲產生，他主張以國家主義替代自由競爭中的個人主義，並反對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中有關私有財產制的主張。

5 黃培蓉：2002.2.6，南投埔里劉案章錄音訪談記錄。

在動員體制下的南投陶產業，也因應了此項政策而有了軍需用品的製作，例如防空缸，是爲了埋設傘兵坑所做的，其他像『北投窯業株式會社』所生產的地雷及手榴彈外殼與各個窯場亦大量生產通訊管線所需的陶管及其他相關的工業產品等（陳新上 1996），都是這個時期的產物。在動員體制下，陶器產業負擔起軍事工業的責任，而平日對此所做的物資、人力等研究調查，則是透過組合會的力量知道哪裡有可被徵召的相關產業人才、資源等，以致於對各方面都可很快的被掌握及動員，根據當地耆老張火旺先生說：『只要會做防空缸，就可以不用當兵』⁶，因此在勞力統治的規則下，南投陶以技術取代勞力，而南投燒也隨著時代需要增加了『符合國家目標』的防空缸形制，形塑出產業合理化的理由。

貳 一個學習型的產業形式

一、集體知識的文化面向

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中，同樣的物品往往跟隨著它的環境需求產生不同的意義形式，在這形式的背後隱含著是整個時代的『可理解性』，南投陶，擁有不同時期發展的形制，從整個發展脈絡中不斷地累積與再創造的過程裡，某一程度代表了整個社會價值體系的轉換，也就是反映了一種適應社會的能力。

正如歷史獨特派論創始者Boas的觀點中認為『文化所擁有的各類型藝術及其特殊的表現方式，是由自然環境各種刺激、物質運用的限制、藝術家的表現特質、和異文化的歷史關係、文化成員的思想信仰和價值觀等幾個狀況的影響而產生的』。而某些人類學家亦認為，透過一個民族對『物』的理解觀念，可得到那些根深蒂固而深植於某一社會文化的範疇中有關物與美學的集體知識（王嵩山，1999：7）。因此從物質文化來說日治時期的『南投陶』是一種特定時空下的表現行爲，從作品反映出日治時期殖民地的政策所引領的台灣人精神中，觀察當代文化價值體系的切面。

二、南投陶的學習力展現

1901年南投廳長小柳重道氏秉承了南投署長矢野武平氏的南投陶窯業發展計畫，設置了技術者養成所，開啓了南投陶的曙光，此期台灣總督府撥了1500元的補助金聘請了位於日本常滑的技師龜岡安太郎氏做技術指導，在當時所謂的『技術養成所』顧名思義即是以技術性的教育爲主。在日治時期總督府對殖民地的一切建設，是以母國所用爲最終目的，因此首先要做的就是致力於本地經濟開發，也因為這一層需求，『量產化』則成爲提高效率的一項必要工作。在1907年補助金停止撥放後，陶瓷的資源漸轉入北部，因此在1901年至1907年爲止的這六年中，正是奠定整個南投陶產業基石的年代，根據1931年總督府殖產局的工場名錄的內容，記載了『到1934年爲止南投

6 黃培蓉：2002.1.24，南投市張火旺錄音訪談記錄。

街已有五間主要的陶瓷工場，產品內容多為食器與水甕居多⁷，從當時各窯場的創立年代來看以劉樹枝在1918年成立的『協德陶瓷工場』最早，這與當時停止補助金的撥放已相距十一年了，中間沒有任何文獻的交代，有些歷史觀點的學者認為那是一個因為技術傳承中斷而造成品質良莠不齊並進入削價競爭的階段，相對此一立論的說法是，製陶師在面對一連串的混亂過程中，從錯誤的嘗試裡不斷地在學習整個市場的運作機制，並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子。這從南投陶窯場開始相繼成立的時間軸來看最為明顯，1919劉樹枝成立『協德陶瓷工場』後，1920年張難與廖炎亦分別成立了『南投製陶公司工場』、『協義陶瓷工場』，一直到1926年李元的信成（勝）陶瓷工場開始有了土管的製作與多元的創作部分⁸，在此八年裡南投陶的發展漸形興盛，所以在之前十一年的過渡期裡，正如毛蟲要幻化成蝴蝶之前的蛹，看似沒有變化的表象，其實內含著是一種辛苦而徬徨的成長關鍵，從學習力的觀點來看可說是一個醞釀能力的階段。

三、中央研究所對南投陶產業的技術影響

1921年中央研究所成立，工業部無機工業化學科對陶瓷產業進行一系列的研究及調查，對於土質的改良、釉藥的調配等投入相當多心血，對台灣陶業尤其是外資的日場頗多助益。1927年南投街的這些窯場和國家發展政策配合集結成立『南投陶器同業組合會』，並開始獲得州、街政府的補助，聘請在北投指導日本陶藝的技術師賀本庄三郎氏及富浦氏擔任技術員講習會的講師，課程內容包括講解灌漿與石膏模具的製作、改進燒窯練土的設備和購置電動馬達旋轉台等，以技術導向為主的課程安排。然而將這次的技術指導與1901年的『技術養成所』時代互為比較，就可很清楚的發現日治時期對於培育陶藝人才這件事是著眼於以發展經濟為主的導向，技術能力儼然成為產業知識的主要內容。

對南投燒形制的發展來說，雖然在整個技術課程的內容上，陶藝美學涵養方面的安排並未特別涉入⁹，但在整個時代的趨向裡，市場性的偏好、陶藝先生的風格影響等因素與原生的這塊土地交織出自我的一套美學體系也就是漳泉、福州、常滑的綜合性風格¹⁰，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南投陶因為地理環境的關係，促使窯場在燒製陶器的時候會就地取材投入，而投入的芒草進行燒製，其造成的大量落灰反而添加了南投陶的質樸粗獷感，以上種種經驗，一方面造就了南投陶『藝』成為地方特色的不可取代

7 台灣總督府殖產局，1931，《工場名簿》，頁18；台灣總督府殖產局，1940，《工場名簿》，頁26；陳新上，1996，《日據時期台灣陶瓷發展狀況之研究》，國立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頁48。

8 李元創立『信成陶瓷工廠』其創造了南投燒三絕-陶棺、金魚缸、習字磚，並成立了『陶棺公司』，是臺灣陶瓷史上的一大創舉。

9 黃培蓉：2001.2.6，南投埔里劉案章錄音訪談記錄。

10 根據陳新上的說法：南投陶瓷器在技術得傳承上呈現一種綜合性的發展，以漳泉的陶瓷技術為主，後期加上福州師傅的傳統技術，而在日據時期又受到日本技術的直接影響，成為一種綜合風格形式的發展，另外，所謂『南投法』的製陶技術則有別於泉州、福州、日本的技法另成一派，成為台灣陶瓷技術的四大流派之一。陳新上，1996，《日據時期台灣陶瓷發展狀況之研究》，國立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頁48。

性，一方面亦連結起窯場與居民的互動關係，成為一個與窯場共生共榮的生活型態。

11

總體而言。在整個時代脈絡下的『南投燒』，可以說是一項透過學習機制而產生的產業。但是真正影響南投陶產業興盛的關鍵則是1907年停止補助後的學習意願，在自然法則的汰換程序中，學習力的強弱是產業的生存之道，就像當時劉樹枝家中是賣米的，而李元甚至還是因為流浪到南投才藉由割官草認識窯場與陶瓷器。這些人的奮鬥過程，在在都顯示了南投燒的可貴，並不是這裡累積了多少資源，有多久歷史，而是愛土的那顆堅持的心，一接觸了就永不放棄的願力、學習力。

參 『南投燒』光環的背後象徵

一、 南投陶反映地方文化的樸質性格

民間工藝造物的基本功能有三，即造物的實用功能、審美功能和認知功能，其中審美及認知功能皆是依附在實用功能的基礎上，形成民藝品中樸質而動人之處。在先秦時期墨子曾說過：『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暖，然後求麗；居必常安；然後求樂。』這裡他主張的是需求的先後次序。造物，首先是為滿足人類實際的需要，實用是它最基本也是最直接的目的（潘魯生，1992：6）。民藝品正是因為生活需求所衍生出來的功用性而被界定為最接近常民文化的真實反映。

在1850年至1900年間，美術工藝運動之父威廉·摩里斯¹²（William Morris, 1834～96），主張用手工藝品代替機器時代無特色的工業產品所引領的工藝思潮，這或許也可說是是一種人類文化上的『復歸』現象¹³，回歸到實用功能的樸素哲理，正如郭沫『俗到極處方入雅』的說法，人之常習常情曰俗，也就是說人自然流露出的美感與習慣的器物，具有一種真誠的雅致，這也是工業商品無法取代民藝品的地方。民藝品除了實用性與審美作用外，認知的功能¹⁴亦常常反映在造物的過程中，這中間包含了

11 當年南投地區的環境遍長芒草，因此就地取材成為當地窯場主要原料的來源。然而用芒草燒出來的產品落灰會較多，此種現象反而造就了南投陶的粗獷感，成為產品的一項特色。因為當年窯場承載著此地區的經濟型態，所以社區的剩餘勞動人口往往以砍芒草為家庭副業，在工作的經驗中當地人流傳一句話『芒草割牛』來形容它的銳利與辛苦，但不可置疑的，藉由這些勞動機會讓當地居民與窯場有了更多互動的機會，透過這些交流串起了居民間的關係，甚至造就了當年流浪至此的李元成為陶業傳奇，到了農曆十月附近的窯場聯合酬神做戲，更成為一個全村性的娛樂。

12 威廉·摩里斯所倡導的美術工藝運動，在內容上他認為在設計要提倡簡化，不管建築或家具都要依據它本身的材料和製作的過程來進行設計，至於表面的裝飾應該保持平面而不必要製造深遠的幻景。

13 『文化復歸』現象是由張道一先生所提出，亦稱為『反芻現象』，他指的不是簡單的週而復始，而是在文化層次的提高。

14 認知功能是造物過程的全部構想或主觀設計思想，是設計者對創造物在適應使用者的心理、物體本身的結構、實用功能與審美功能的吻合，以及典型性與一般性統一等方面整體的考量。潘魯生，1992，〈論民間工藝造物的基本功能〉，《中國民間美術》，漢聲編輯出版社，頁82。

匠師特有的經驗性、風俗習慣、感知能力等。

南投陶，從實用功能來說，滿足了『資生』與『安適』的條件¹⁵，例如豬油罐、桌腳等產品都會刻意留下一圈置水處，以防螞蟻進入的設計等，單純的造型反映著智慧的呈現，從審美功能來說，鐵斑的印記、落灰的沾染，是當地土質與地理的真實呈現，從認知的功能來說，匠師因為受到日本陶瓷的細作技術與共同生活經驗的影響，使他們彼此在創作思維上保持貫通性，而陶器的造型則普遍傾向於摹仿自然為對象，是一種心與眼的對照表現，也就是所謂的『心眼設計』。因此，南投燒不僅是總結科學知識（技術）和形象價值（仿生）的產物，其亦透過認知功能的作用啟發了匠師樸素的造物創作能力。

南投陶以一種平凡的物質型態，細膩的存在於地方人們的生活環節中，交織出鮮明的地方性格。

二、南投陶的光環標記

日本政府在1902年成立『台中州立物產陳列館』後，相繼在1915年成立『新竹州商品陳列館』、1919年成立『南投郡物產陳列館』（即聚芳館）、1926年成立『高雄州物產陳列館』，一時之間陳列館的設立成為一股熱潮，這個現象亦代表了在這個時間點上有一些施政成效的東西產生，這些內容包括了本島及南洋的生產品、相關產業的圖書資訊及各種商品的研究調查成果¹⁶，陳列館利用這樣一個成果空間形塑出一個商品知識的場域，無形中不僅加強了商品技術的互通性，更帶動了民眾對地方的認識。換言之，這個展示空間的內涵物成為日本政府施政的成果與民眾對地方產生認同的媒介。

15 所謂『資生』，就是為人所用，從獸皮樹葉遮身的『遮羞布』到現代綾羅綢緞的各式新奇服裝，其目的仍離不開打扮。從人類古老的工具石斧到今日使用的鋒利鋼刀，都是用切砍，其最基本的用途一直傳承延續下來。所謂『安適』就是使用這些物品的同時，還滿足人們生產、生活中的安全感和舒適感。潘魯生，1992，〈論民間工藝造物的基本功能〉，《中國民間美術》，漢聲編輯出版社，頁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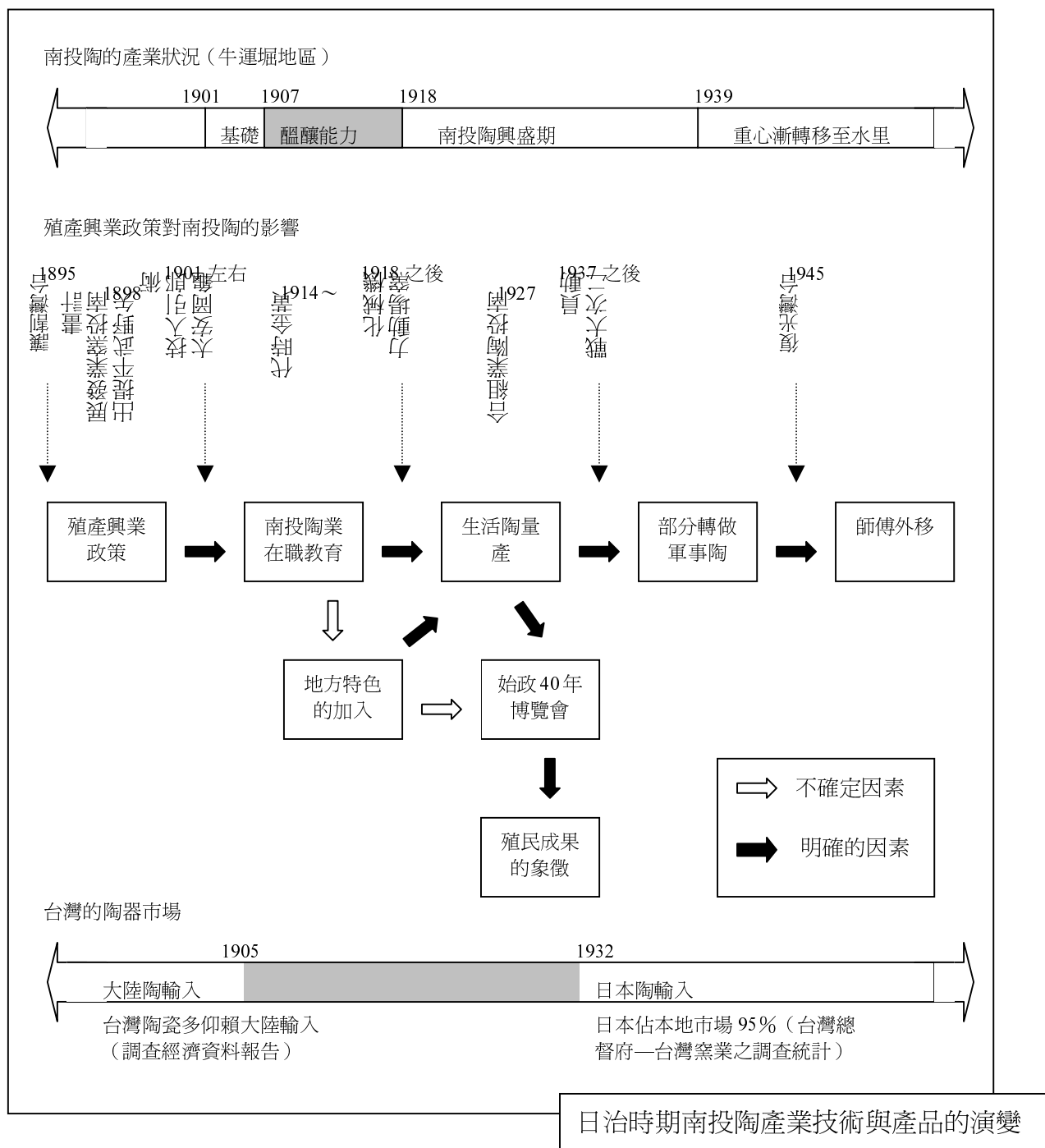
16 台灣總督府編，1942，〈第八章殖產局商業課〉，《台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95》，頁435。

『南投燒』與『大甲藺草』在當時被視為代表大台中州的名產而至陳列館展示，在這個空間中形塑出這個產業一個光榮的記號，也透過這個窗口打響了南投燒的名號，從文獻資料中知道當時代表這個產業的是由劉樹枝先生所做的產品為主，而劉樹枝的作品深受其師龜岡安太郎的影響，作品不但帶有東洋常滑的風格亦融合了本地傳統的製陶技巧，因此有別於南投當地的傳統手藝¹⁷。1935年『始政四十年博覽會』劉樹枝的『南投燒』代表台中州的產業被推向了國際舞台，在當時被評選上的作品必須擁有經濟實用的價值、學理應用要點、重要物產的位置、出品人的營業狀況、功績等要項的鑑察要點，因此產業化的形式成為工藝評選的一項標準。另外，在『始政四十週年紀念台灣博覽會誌』中對於博覽會的開設意義有這麼一段描述：『「台灣是一個瘴煙蠻雨之地，其人民難以治理再加上化外之民的生蕃凶猛盤據…」，這是李鴻章對孤懸於世界文明之外的台灣所做的感嘆。如今我們統治了台灣40餘年以來，在一視同仁的天皇恩澤下，經營成今日的樂土，成為世界殖民史上成功範例…」，以上的說法證明了博覽會內殖民思想的真實內涵。總體而言，頂著這個光環的『南投燒』價值在於向國際彰顯日本殖民政績成為它在此時的一個主要任務。

17 蕭富隆，1993，《昨日黃花上》，文物雜誌，12，頁55。

肆 小結

政策的施行與民間陶瓷業的發展關係，促成了技術能力、市場需求、風格樣貌等的轉變。從以上影響南投陶發展的政策歷程中，歸納出以下五階段影響南投陶產業發展政策的演變。



1. 殖產興業—產業革命的啓動

殖產興業政策的提出促成近代日本產業革命的發展，也直接影響了台灣進入產業工業量產化的階段，南投陶產業在此政策扶植下，從技術的養成開始到產業興盛的狀況，南投陶因為技術的提升而得以創作更多元的商品並成為一個產業化的傳統行業。

2. 在職教育——引出創作的潛力

南投陶最令人動容的地方在於有著全村莊人共同汗水的付出，可說為一種集體創作的過程。在這過程中透過需要製作陶器這件事，牽動起居民彼此之間的互動情感與對窯場的認識，這和日本政府所給技術養成教育方式有所不同的地方在於前者是集體的分工行為，後者是單獨業者的能力提升，前者是隨性的勞動機制，後者是專業的知識技能，因此，技術養成對陶藝師傅的教育與居民和窯場的分工行為，形成了一個與窯場共生共榮的學習環境，這二者間交互形構出一個用陶氛圍的場域，也啓發了陶藝師傅樸實的造物心念和創造能力。

3. 量產技術——經濟利益的提升

早期的南投窯業，提升了地方經濟的發展。受到工業化的影響，由政府所提供的資金補助、機械設備、技術傳授等，皆是以工業開發為主要導向的經營方式，南投陶在此階段以『量產』技術提升了更多的經濟性利益並進入了產業化的經營型態。

4. 象徵符號——殖民成果紀錄

從『台中州立陳列館』至『始政40年博覽會』，只有劉樹枝代表『南投燒』參展，其產品富有東洋與本地方的特質，如日本型式的雕塑或鐵斑、吉祥圖案的裝飾性留存等，以『意匠』的觀點來看，除了有量產化的技術，更有創作者的創意加上地方性的樸質呈現，這時南投陶形成一個經營殖民地的成果紀錄的象徵物。

5. 國家目標——軍事需求的用途

在動員體制下的南投陶產業，被賦予了軍事工業的階段性任務，產品形制的需求著重在技術功能方面，當時所稱讚的『南投燒』細作，在戰爭期間，像這類的細件作品都是算奢侈品的一種是必須被管制的，因此漸形沒落，這時反而以『大』『粗』見稱的南投陶款式獲得青睞，所以此時南投陶被彰顯的意義乃是在提供戰事需求的目的。

南投陶跟隨著不同的環境需求不斷地在變化它的形式，但是這個需求是誰的需求呢？從早期因為必須要解決住的問題而產生的磚瓦形制，然後，為了解決民生問題，所產生的土器製品，起源點雖然像是表面的單純需求，但是裡面卻引含了『渡海禁令』下不得不的無奈。日治時期，這種現象更加明顯，從當時日本的『脫亞論』開始，即將殖民地的經營納入成為『一流國』的展現，在此思維下南投陶容顏，承負著代表這

個證明的成果意義，也就是說，日治時代代表『南投燒』的陶器是肩負任務的，這種任務是一種國家記號所賦予的改變，並隨著國家所給與的技術知識展現出一套特定的美學標準與功能形式。事實上，南投燒的形制功能雖然受到以上諸多因素的影響，但是任何技術都存在相應原始的認知機能（潘魯生，1992：6），也就是回歸到『人』的意識上。南投燒，因為有人對物的『心眼設計』包含其中，啟發了陶藝師傅樸實的造物心念和創造能力，這些累積構成了傳統的內涵，成為現代陶藝家再創傳統的利基，那或許才是屬於南投燒真實動人的面貌。👤

（本文作者係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研究所研究生）

參考書目：

1. 蕭富隆，1996，《台灣陶瓷產業發展1665-1995》，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2. 陳新上，1996，《日據時期台灣陶瓷發展狀況之研究》，國立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
3. 林繼文，1996，《日本據台末期（1930～1945）戰爭動員體系之研究》，稻鄉出版社。
4. 潘志奇，1957，〈台灣之社會經濟〉，《日據時代台灣經濟之特徵》，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5. 王嵩山著，1999，〈物質文化與美學的社會性〉，《集體知識、信仰與工藝》，稻鄉出版社。
6. 台灣總督府編，1942，〈第八章殖產局商業課〉，《台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95》。
7. 連雅堂，1976，《台灣通史》（再版），台北：眾文。
8. 服部武彥氏著，蕭富隆、蕭讚村譯，1994，〈台灣的陶業〉，台灣文獻，43：1。
9. 南投縣立文化中心編，1995，《邁向現代陶之路—南投陶兩百年專輯》，南投縣立文化中心。
10. 蕭富隆，1993，《昨日黃花上》，文物雜誌，12。
11. 蕭富隆，1993，《泥土的故事—南投陶的發展與變遷概要》，南投縣立文化中心。
12. 蕭富隆，1992，《南投陶的發展與變遷初探》，史聯雜誌第21期。
13. 黃永松等，1992，《中國民間美術》，漢聲編輯出版社。
14. 田村貞雄著，葛東萊譯，1992，《殖產興業》，台北：方智出版社。